

# 朝鮮時代文人對蘇東坡詩文的“受容”及其蘇東坡觀\*

조규백\*\*

## 【 차례 】

- 一、緒論
- 二、朝鮮時代의文學思潮及文人對蘇東坡의接受
- 三、朝鮮時代文人의蘇東坡觀
- 四、朝鮮時代文人接受蘇東坡의表現及其原因
- 五、結論

## 【 국문초록 】

조선시대에 한중문화교류를 통해 중국문학의 풍부한 경험을 능동적으로 수용한 사례는 보편적이다. 본고에서는 蘇東坡의 인생과 문학이 어떻게 조선시대 문인의 모범이 되었으며, 우리 문학의 내용을 풍부하게 하고 나뉘는 문화의식을 지니게 하도록 하였는지 파악하기 위해, 조선시대 문인의 소동파 시문 수용 및 그 蘇東坡觀을 논술했다.

조선시대의 소동파 열기 변모양상은 南宋前期, 清代, 그리고 當代(1980년 이후)에 있어서의 중국에서의 소동파 열기의 頂點과 어느 정도의 시차를 두고 유사한 파도의起伏를 보이고 있다. 한국에서의 소동파 열기는 高麗中期에 최고조를 보이고 있고, 조선전기에도 이러한 경향은 지속되고 있다. 朝鮮中期에는 唐詩에 대한 유행의 고조로 소동파에 대한 열기는 약해지고 있다. 朝鮮後期에 이르러 성리학(주자학) 자체에 대한 반성과 清代문예사조의 영향으로 소동파열기가 다시 고조되고 있다.

조선시대 문인의 ‘蘇東坡 및 그 詩文에 대한 관점’은 긍정적, 부정적, 절충적 관점

\* The work was supported by the Korea Reserch Foundation Grant (KRF-2001-037-AB0006)

\*\* 濟州觀光大學 中國語通譯科 教授

으로 3분된다. 긍정적 관점의 실례로는 소동파를 “兼傑之士”, “和而不同”의 인물로 평하였으며, 그 시문을 “豪氣”, “뛰어난 운치가 푸른 노을을 능가함”, “신선의 경지”, “治世의 氣象을 실증할 만함” 등으로 높이 평하였다. 부정적 관점의 실례로는 高麗人의 志慮향상을 막기 위해 高麗에 서적을 수출하지 못하게 하였기에 “도량이 좁고 은혜가 적다”는 견해나 ‘典故를 많이 사용함으로 인한 작품 자체의 난해성’, 그리고 純儒(순수 유학자)의 관점에서 동파를 “유교의 쯤벌레”로 폄하한 평이 있다. 절충적 관점의 실례로는 ‘작품의 단점을 인정하나 욕심이 적은 것은 높이 평가한다’는 것이나, ‘문장이 웅대하나 배우기 어렵다’거나, 그의 시가 “조잡하지만 氣가 盛하여 그 조잡함을 알지 못한다”는 등의 평이 있다. 특히, 부정적인 관점은 북송의 洛蜀黨爭, 소동파의 불교, 도교, 莊子 애호의 성향, 그리고 소동파의 협소한 高麗觀 등과 내재적인 관련성을 지니고 있다. 더욱이 조선시대 유학은 주로 중국의 程朱學派를 계승한 관계로 소동파와는 학파나 학문관점의 차이가 있어 대립되는 관계에 있었다. 또한 高麗로 도서 유출을 금지하도록 건의한 점 등 소동파의 고려에 대한 편견이나 정치행적에서 나타난 反高麗의 경향이 조선시대 문인의 소동파관 형성에 영향을 준 것은 간과할 수 없다. 그러나 대체적으로 조선시대 문인의 소동파에 대한 평가는 상당히 높다고 할 수 있다.

조선시대의 많은 문인이 소동파의 〈赤壁賦〉를 애호하여 각지에서 “赤壁船遊”의 기풍을 재현한 점이나, 조선후기 일단의 시인이 “拜坡會(소동파를 숭배하는 모임)”를 성립시켜 소동파의 생일을 기념하는 詩會를 개최하고 있다는 사실은 당시 문인의 소동파 애호 풍조를 실증하고 있다.

조선시대 문인의 소동파 수용의 원인은 아래와 같이 개괄할 수 있다. 첫째, 동파의 인품이나 문장의 수준이 큰 흡인력을 지니고 있기 때문이다. 둘째, 조선시대의 문예수상 思潮, 조선이 宋나라를 立國의 주된 모델로 삼은 점, 그리고 문학적으로 唐宋八家文을 중시한 점이다. 일부 純儒들은 학파나 사상의 차이로 비판적, 선택적으로 수용하기도 하였다. 셋째, 조선시대 문인들은 동파와 유사하게 士禍, 당쟁, 전쟁 등을 겪어 그 처지의 유사성으로 인해 동파의 위인과 문학에 共鳴할 수 있었다.

요컨대, 조선시대 문인은 소동파를 인생과 문학에 있어 하나의 전형적이고 이상적인 모델로 삼았다. 또한 소동파는 지식인층의 고민에 대한 해결요소를 제공하고 불우한 지식인에게 共鳴을 주었으며, 그의 출사와 은퇴에 대한 관점은 조선시대 문인들에게 깊은 계시를 주었다. 그 문학의 수용을 통해 문인들은 문학의 수준이 향상될 수 있었으며, 나아가 독자적인 정신세계를 표현할 수 있었다.

주제어 조선시대 문인, 蘇東坡, 蘇東坡觀, 受容, 豪傑之士, 和而不同, 洛蜀黨爭, 高麗觀, 程朱學派, 赤壁賦, 赤壁船遊, 拜坡會

## 一、緒論

蘇軾(公元1036-1101, 陰曆), 號東坡, 是中國北宋傑出的文人、政治家和藝術家。他的詩文具有長江大河般的豪放氣勢, 森羅万象的豐富內容, 獨特的藝術風格, 并對前代的各種文體均有獨特運用。故其詩文具有了一種令讀者一旦關注便愛不釋手的興味。在中國的宋代、清代和當代, 都研究蘇軾成風, 其他各代即使不愛宋代文學的人也往往喜愛蘇軾詩文。

在朝鮮時代(1392-1910)文藝思想的演變過程中, 通過韓中文化交流, 主動地、積極地接受中國文學的豐富經驗的事例相當普遍, 特別是東坡及其作品如何成爲朝鮮時代士大夫文人創作的楷模, 如何使文學升華爲內容豐富又具有自主性的韓國式的文化意識, 追溯并探討韓國文學這種精神世界的構成, 特別是衡量朝鮮時代文人如何設定以中國的蘇東坡爲文化模型的理想對象, 力求達到與其相似的境界。同時又表現出自我化、個性化的獨特精神世界, 這一工作十分有意義。

朝鮮朝文人接受中國漢詩和散文, 并通過創作漢詩文來表現韓國人的感情和思想, 要從流傳至今的作品中辨別其中的中國式因素和朝鮮式因素, 并決定用什麼方法來研究它們, 這是非常不容易的。

在“韓中兩國文化交流史”上, 接受中國文學, 尤其是接受蘇東坡文學, 存在某種特殊的性質, 并有自己的問題和難處。當時的士大夫是以怎樣的態度來接受蘇軾, 又是怎樣個性化地表現自我的內心世界, 并最终達到創造性地接受, 有必要進行系統的研究。

本文擬從比較文學的角度考察以上問題。其研究基準是以蘇東坡及其詩文爲發

信者，以朝鮮朝代表文人的詩文集、各種詩話為接受者，並參考了相關的資料和以往的研究成果。

## 二、朝鮮時代的文學思潮及文人對蘇東坡的接受

首先我們概略地考察一下朝鮮時代的文學思潮與文人接受中國文學尤其是蘇東坡文學的關係。韓中兩國通過使節的交流，擴大了兩國文人之間的交流。而中國典籍的不斷傳入，也使兩國相互之間的文化交流日益頻繁。蘇東坡是在高麗、朝鮮時代影響最大的中國文人之一。李奎報(1168-1241)把高麗中期的蘇東坡熱描述如下：

且世之學者，初習場屋科舉之文，不暇事風月。及得科第，然後方學為詩，則又嗜讀東坡詩，故每歲榜出之後，人人以為今年又三十東坡出矣。(李奎報，〈東國李相國集〉，卷26，〈答全履之論文書〉)

這反映出高麗時代文人把蘇東坡視為學問和文章的最高典範。由於儒學立國的統治理念、文學思潮的轉變以及學問觀念的差異，朝鮮時代文人對蘇東坡文學的接受程度有所不同，但是，總體看來，蘇東坡文學仍在不斷流行。因為蘇東坡文學本身所具有的魅力，使得它得以超越國境，傳到朝鮮。在朝鮮也具備了讓它成為本國文學滋養成分的文化土壤。朝鮮時代的文人已具備了讀寫漢文的能力，為接受蘇東坡文學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朝鮮時代的儒學主要以性理學為統治理念，而文學思潮也按照儒學模式建立和發展，從而形成了前期(儒學建立期：太祖-第13代明宗)，中期(儒學發展期：第14代宣祖-第20代景宗)，後期(儒學反省期：第21英祖-27代純宗)三個時期。<sup>1)</sup>

1) 洪禹欽，〈擬把漢江當赤壁-韓國蘇軾研究述略〉，曾棗莊等著，〈蘇軾研究史〉，江蘇教育出版社，2001. 3，588-589頁。用語和分期，筆者略有改動。

儒學尤其是性理學(朱子學)體制在前期確立，中期得以鞏固之後，儒學以外的思想受到排斥，甚至被視為異端。直至後期，由于對性理學的反省，儒學的統治局面才有所鬆動。在不同時期，對中國文學特別是蘇軾文學的接受是不盡相同的。現在來考察前人對朝鮮詩風轉變的幾條具有代表性的評論。

金宗直(1431-1492)在《青丘風雅序》(《青丘風雅》)簡單明了地總結了從新羅末到朝鮮前期的漢詩思潮：“得吾東人詩而讀之，其格律無慮三變：羅季及麗初，專襲晚唐：麗之中葉，專學東坡：適其叔世，益齊諸公，稍變舊襲，裁以雅正，以迄于盛唐之文明，尤循其軌轍焉。”

李睟光(1563-1628)認為朝鮮前期推崇蘇黃，中期轉學唐風：“我東詩人，多尚蘇黃，二百年間，皆習一套。至近世，崔慶昌、白光勳始學唐，務為清苦之詞，號為崔白，一時頗效之，殆變向來之習。”(李睟光，《芝峰類說》，卷9，文章部2，詩)

金萬重《西浦漫筆》卷下(景仁文化社影印本)云：“本朝詩體不啻四五變：國初承勝國之緒，純學東坡，以迄於宣靖，惟容齋稱大成焉。中間參以豫章，則翠軒之才，實三百年一人，又變而專攻黃陳，則湖蘇芝(湖陰鄭士龍，蘇齋魯守慎，芝川黃廷彧)鼎足雄峙。又變而反正於唐，則崔白李(崔慶昌，白光勳，李達)，其粹然者也。夫學眉山而失之，往往冗陳，不滿人意，江西之弊，尤拗拙可厭。”金萬重認為，朝鮮初繼承高麗，純學蘇東坡；繼而學黃庭堅、陳師道；中期學唐，指責學蘇之弊在于“冗陳”，學習江西詩派之弊在于“拗拙”。

金澤榮(1850-1927)則認為，朝鮮中期以“豐雄高華之趣”為主，後期以“奇詭”“尖新”為主，隨後出現了以詩書畫三絕揚名于世的申緯：“吾東之詩以高麗李益齋為宗，而本朝宣仁(宣祖，仁祖)之間，繼而作者最盛，有李五峰、車五山、白玉峰、許夫人、權石洲、金清陰、鄭東溟諸家。大抵皆主豐雄高華之趣。自英廟以下則風氣一變，如李惠寰、錦堡父子、李炯庵、柳冷齋、朴楚亭、李薑山之倫，或主奇詭，或主尖新，其一代升降之迹，方之古則猶盛晚唐焉。惟申公之生，直接

薑山諸家之踵，以詩畫書絕聞於天下。”（金澤榮，〈申紫霞詩集序〉，〈申紫霞詩集〉，金滄江重編本）

綜合以上四說，新羅末、高麗初，學習晚唐詩。高麗中期到朝鮮前期，以宋詩風，尤其是以蘇東坡詩風為主流，特別是朝鮮前期受蘇東坡和江西詩派的影響較大。朝鮮中期，由於對宋詩的厭煩，加之受“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的明代擬古派的影響，因而唐代詩風受到推崇。朝鮮後期，“實學者”作為使節到燕京進行學術交流，受到當時清代蘇東坡研究熱潮的影響，再次對蘇東坡給予了高度關注。

就漢文散文而言，基本上和漢詩類似。朝鮮時代漢文散文的創作模型和標準是秦漢以前的儒家經典、諸子文、唐宋八家文等古文。其後由於認為學習諸家體不如學習一家體，因而逐漸形成了只專攻先秦兩漢（司馬遷、班固）、唐宋八大家等某一個時代、某一個作者文體的局面。與此同時，更加重視實用性，如學中國（明、清）的外交文、朝廷的政令文等<sup>2)</sup>。東坡的散文，如〈赤壁賦〉等名作，則無論哪個時代皆受到文人的喜好。

由此看來，朝鮮時代蘇東坡熱的轉變與中國文學思潮的轉變有着類似的波瀾起伏，但就其時間和程度而言，略有差異。這是因為中國的文學思潮對朝鮮的影響以及朝鮮時代本身的儒學（性理學）的轉變都需要一個過程。當然，朝鮮本身詩文思潮的轉變也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因素。總之，韓國的蘇東坡熱在高麗中期達到頂峰，並持續到朝鮮前期。朝鮮中期唐詩漸漸流行，對蘇東坡的學習有所減弱。到了後期，由於對儒學（性理學）本身的反省，加之清代文學思潮的影響，蘇東坡熱再次湧起。

### 三、朝鮮時代文人的蘇東坡觀

朝鮮時代文人的“蘇東坡觀”有肯定、否定和折衷三種不同的態度。對蘇軾持肯

2) 李丙嘯等著，〈漢文學史〉，새문사, 2003. 2, 336頁。

定態度的文人占多數，這裏我們以申欽(1566-1628)《讀東坡偶書》(《象村集》，卷5)詩為中心，結合其他的一些文人的詩文，來看看朝鮮時代文人對蘇軾的肯定看法：

前身戒和尚，當世蘇東坡。如今幾百年，豪氣猶不磨。  
脫落進退間，浮雲於我何。南荒與紫清，一視無等差。  
半夜赤壁游，逸韻凌青霞。隻字落人間，萬古傳菁華。  
晚參曹洞禪，了盡恒河沙。是非俱兩空，歷劫如擲梭。  
所嗟天地閉，平陸生矛戈。枉直誰更分，賢邪竟同科。  
時命不可謨，警余為悲歌。

戒和尚指正授戒的和尚，傳說蘇軾前身為戒和尚，釋惠洪《冷齋夜話》卷七云：“哲宗問右鑄(宦官)陳衍：‘蘇軾襯朝章者何衣？’衍對曰：‘是道衣。’哲宗笑之。及謫英州，云居佛印遺書追至南昌，東坡不復答書，引紙大書曰：‘戒和尚又錯脫也。’後七年復官，歸自海南，監玉局觀，作偈戲答僧曰：‘惡業相纏卅八年，常行八棒十三禪。却着衲衣歸玉局，自疑身是五通仙。’”此詩前四句即謂蘇軾是戒和尚的後身，幾百年來豪氣猶存。下面就分寫蘇軾的豪氣，“脫落”四句，稱他超越進退，視遠謫南荒與高居廟堂(紫清)沒有區別(“無等差”)。“半夜”四句稱頌他夜游赤壁，逸氣凌空，一篇《赤壁賦》，名垂千古。“晚參”四句稱頌他晚年深參佛禪，是非兩空，更視“歷劫如擲梭”。最後六句更對蘇軾的不幸遭遇發出了深沉的感慨，人生天地間，到處都是戈矛，枉直、賢邪不分，無法掌握自己的命運。

申欽不僅慨嘆蘇軾生前歷盡劫難，而且死後也常為人胡褒亂貶。一是理學之士的攻擊：“東坡豪傑之士也。介甫當朝而不肯附者，固素履也。至於涑水入相，亦不雷同，此非和而不同者耶。只以得罪程門，晦庵攻之不遺餘力，而世之儒者遂擯之如不及，可謂過矣。每訪其周公與管蔡，恨不茅三閭之句，未嘗不瞠乎其後也。”<sup>3)</sup>

3) 申欽，《求正錄》，《象村集》，卷51，民族文化推進會，1994.9。

申欽認為東坡是堅持節操的豪傑之士，其理由有二：其一，王安石當權實行新法時，與之對立的蘇東坡固守自己的看法。其二，司馬光入相的元祐時期，蘇東坡也不附和雷同。當時東坡因性格、學問見解與程頤不合，因而釀成洛蜀黨爭。繼承程頤學問的朱熹，不遺餘力地攻擊蘇東坡。而繼承程朱學的世之儒者（這裏主要是指朝鮮時代的儒者，也採取極力排斥東坡的態度。二是唐詩派的攻擊：“東坡詩文俱神境也。世之學唐者常皆之。若簡摘其艷麗，略為數卷書行于世，何渠不若唐家時世妝耶。只以家數甚大，陷井之見，有望洋之嘆爾。”（申欽，〈清窗軟談〉，〈象村集〉，卷59）申欽認為，蘇東坡的詩文都進入了神境，而學唐詩的文人常常謾罵東坡，這是當時的風氣。如果把東坡的優秀作品匯集成冊，則完全可以與唐詩媲美，只是他的詩境甚為遠大，不禁令井底之蛙望洋興嘆。

權應仁的〈松溪漫錄〉也有與申欽類似的觀點，批評尊唐派專尚晚唐而不讀東坡詩的時風：“今世詩學，專尚晚唐，閣東蘇詩，湖陰聞之，笑曰：‘非卑也，不解也。’退溪亦曰：‘蘇詩果不逮晚唐耶？’……高麗時，每榜云，‘三十三東坡出矣。’麗代文章優於我朝，而舉世師宗，則不可謂之卑矣。若薄其為人，則晚唐詩人賢於蘇者，幾何人耶？退溪相公好讀坡詩，常誦‘雲散月明誰點綴，天容海色本澄清’之句，所著詩，用坡語者多。”<sup>4)</sup>湖陰即鄭士龍，他認為不是東坡詩的水平低，而是自己看不懂。退溪即李滉，李滉不僅否定所謂蘇詩不如晚唐的謬論，而且自己深愛東坡詩句。

黃玹(1855-1910)的〈題東坡集〉(〈黃玹全集〉，上，40-41頁)也是肯定蘇軾的代表作：

東坡學士神仙姿，氣橫素秋萬人往。  
筆下汪汪經國語，兒畜薑薑奴非缺。  
結發入朝老愈勁，文章尺牘皆忠讜。

4) 洪萬宗編，〈詩話叢林〉，亞細亞文化社，1973，181-182頁。



滑稽釀成烏臺案，大步笑入奸碑黨。  
 喚取羽士作功臣，奎星芒角光千丈。  
 瓊琚萬斛留世間，讀者人人快爬痒。  
 壯士籠原縛犀豹，疾雷劈山逃罔兩。  
 又如無邊曠墟濱，急風黑雨吹莽蒼。  
 有時兒女恩怨語，變作九奏鈞天廣。  
 百態橫生不可窮，掩卷欲哭徒悵惘。  
 寄笑後來諸妄人，抽肝擢腎期相仿。  
 先生却在文字外，高風峻節又何仰。

前十句寫這位具有“神仙姿”的羽士，實為宋朝歷史上的“功臣”，謂蘇軾的詩文都是經國之語，賈誼、董仲舒、韓非、商鞅根本不足與他匹敵。他自從結發入朝直至老年，所有文章都是忠言讜論。結果釀成烏臺詩案，死後也被列入元祐黨籍碑，但這也掩蓋不了他的千丈光芒。“瓊琚”十句用各種比喻寫蘇軾的文學成就，有如瓊琚萬斛、壯士縛犀豹、疾雷劈山、急風黑雨吹打無邊曠野，即使“呢呢兒女語”也如鈞天九樂，真是“百態橫生不可窮”。申欽、權應仁反擊了尊唐派對蘇軾的攻擊，黃玟此詩的最後四句則嘲笑摹仿蘇軾的“妄人”：“先生却在文字外，高風峻節又何仰。”蘇軾的文字正是他的“高風峻節”的表現，僅在文字上摹仿是徒勞無功的。

許筠（1569-1618）對宋詩的評價不高，却對蘇東坡的散文推崇備至：“歐陽子、蘇長公之文，為宋大家。歐之風神適麗，情思感慨婉切者，前無古人。長公之弄出機杼，變化無窮，人不測其妙者，亦千年以來絕調。而近世宗先秦西京者，乃薄不為之，此甚無謂。（許筠，《歐蘇文略跋》，《惺所覆瓿稿》，卷13，文部10）許筠贊揚歐陽修和蘇東坡的散文，慨嘆當時文必秦漢的文人，輕視歐蘇的散文，不學習歐蘇的風氣。他認為蘇東坡的散文變化多端、其妙無窮，堪稱千古絕唱。

朝鮮第十九代國王正祖是一位重文的君主，他認為朝鮮的立國規模以宋代為模範，其治法、文體都與宋代相符。他讚揚歐陽修、蘇東坡散文，可驗治世氣象：“我國立國規模，專仿有宋，非但治法之相符，文體亦然，如歐蘇等文，皆可謂黼黻皇猷

之文，足驗治世氣象矣。（正祖，〈弘齋全書〉，卷161，張17。〈日得錄〉，文學）他還比較了三蘇父子的不同文風說：“蘇氏三父子，老如莊生〈說劍〉，光怪百出；長如韓信耀兵，左絳灌而右樊彭，發號出令，變化不窮；少如桓榮稽古，陳車馬印綬，以誇群子弟。”<sup>5)</sup>“老”指蘇洵，認為蘇洵之文如〈莊子〉的〈說劍〉篇。此文載莊子勸趙王要以國家天下為心，而不要以斗劍取樂。〈說劍〉從內容到文風都類似縱橫家的游說，〈莊子〉的文章很多，而正祖單以〈說劍〉比蘇洵，說明他是把握着了蘇洵文章的縱橫之風的。“長”指蘇軾，正祖運用比擬的手段，將〈史記〉中的人物形象如韓信、絳侯、灌嬰、樊噲、彭越等來比喻蘇東坡的文風，韓信用兵，多多益善，從而突出蘇東坡散文的威力與變化。“少”指蘇轍。桓榮是東漢光武帝時的大學者，他曾“陳車馬印綬，以誇群子弟，曰：‘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也。’”（〈後漢書〉卷37〈桓榮傳〉）正祖是以桓榮比喻蘇轍學問淵博，“稽古之力”深厚。

次論對蘇東坡的否定的觀點。朝鮮時代文人對蘇東坡的否定觀點與北宋的洛蜀黨爭，蘇東坡的高麗觀，以及蘇東坡對佛教、道教和莊子思想的吸納有內在聯系。朝鮮時代文人蘇東坡觀的形成是雙方向的。

由于朝鮮時代性理學派繼承程朱學派，因而與蘇東坡在學派、學問觀點及思想上存在巨大差距。宋代程朱學派因洛蜀黨爭，大體上否定蘇東坡。洛蜀黨爭在元祐時期以蘇東坡、程頤兩人的性格和意氣之爭開始，發展到以蘇東坡為首的蜀黨和以程頤為首的洛黨之間的傾軋和學派之爭<sup>6)</sup>。特別是南宋的朱熹繼承程頤，他對蘇東坡的評價頗複雜。他稱美蘇軾的氣節和文章，却痛詆蘇軾思想不純，指責蘇東坡“華而不實”，“坡文只是大勢好，不可逐一去點檢”，“坡文不可以道理并全篇看，但當看其大者”。此外，蘇、朱在文道關係上的觀點也不同。朱熹稱蘇學為“雜學”，甚至

5) 正祖，〈弘齋全書〉，卷181，〈群書標記〉，“八家手圈八卷刊本”。〈四部手圈〉，集部，〈示八子手圈謄本校正諸學士〉。

6) 徐遠和，〈洛學源流〉，齊魯書社，1987.9，38-45頁，參照。

認為蘇學之害遠遠超過王安石新學。朱熹對蘇東坡的批評涉及洛蜀黨爭、蘇王之爭、儒釋之爭、文道之爭等多個層面。<sup>7)</sup>

朝鮮文人對蘇軾的批評，不少都受了程朱學派的影響，如推崇盛唐的許筠(1569-1618)。他在《惺叟詩話》中認為，金宗直文的“竅透不高”之處被推崇古法的人輕視。這是學習蘇東坡、黃庭堅的負面影響：“占畢齋文，竅透不高，崔東臯最慢之，其詩專出蘇黃，宜全古者之小看也。”(洪萬宗編，《詩話叢林》，314頁。)他還認為朝鮮前期詩學，甚至連大儒都不能擺脫蘇東坡、黃庭堅的影響。其餘文人所吸收的更是蘇黃的“糟粕”：“本朝詩學，以蘇黃為主，雖景濂大儒，亦墮其窠臼，其餘鳴于世者，率啜其糟粕，以造腐牌坊語，讀之可厭，盛唐之音，泯泯無聞。”(許筠，《鶴山樵談》，卷1。)

丁若庸(1762-1836)批評蘇詩句句用事：“蘇子瞻詩，句句用事，而有痕有迹，瞥看不曉意味，必也左考右檢，采其根本，然後僅通其意。所以為士也。乃此蘇詩，以吾三父子之才，修終身專工，方得刻鵠。人生此世，可為者多，何可為此乎。”(丁若庸，《寄淵兒》，《與猶堂全書》，第1集，卷21，443頁。)丁若庸是一位博學多識、著述頗多的大學者，他從自身讀蘇詩的經驗中得出蘇詩難懂的結論，這在一定程度上足以反映蘇詩難解之實。雖然典故具有言簡意賅的優點，但由於其隱晦性，因而北宋當時能完全理解蘇詩典故之人已寥寥無幾。例如，蘇詩詩句中有關道教的典故，只有王安石才明白，更何況朝鮮時代的文人。丁若庸還認為：

韓柳歐蘇，其所謂序記諸文，率皆華而無實，奇而不正，幼而讀之，非不欣然善矣，內之不可以修身而事親，外之不可以致君而牧民，終身誦慕而落魄牢騷，卒之不可以為天下國家，此其為吾道之蠹賊也。(丁若庸，《與猶堂全書》，第一集，卷11，《五學論》三)

7) 曾棗莊，《蘇軾研究史》，江蘇教育出版社，2001.3，109-113頁。

臣竊伏念，聖賢有作，則災害異端，必與并起，使之救患拯厄，用茂厥功德，堯之水，湯之旱，孟子之楊墨，朱子之蘇陸，皆其驗也。（丁若庸，〈辨謗辭同副承旨疏〉、〈與猶堂全書〉，第一集，卷9）

在前一則中，丁若庸評論韓愈、柳宗元、歐陽修、蘇軾的序記都“華而無實，奇而不正”，“內之不可修身而事親，外之不可以致君而牧民”的非實用性。而指責蘇軾為“儒道之蠱賊”顯受朱熹的影響，言之過矣。在後一則中，丁若庸在上疏有關天主教之事時認為朱熹為正統，蘇東坡、陸九淵為異端，也顯受朱熹的影響。

朝鮮時代的洪翰周繼承程朱學派的觀點，但他對洛蜀黨爭的看法還是比較客觀的；“東坡與伊川，為年輩，而見伊川收束太過，心笑之，每以謔語加之，至曰‘未聞歌則不哭’，又曰‘枉死市叔孫通制此禮’，又曰‘為劉氏左袒’，又於君前奏曰：‘臣素嫉程某之奸。’以是洛蜀相爭，不啻如水火，而才勝德薄之謂，不能免也。嘗以詩案被逮御史臺，自分必死，至於失色足軟而遺矢云，此說似出於洛黨人口氣，豈可盡信。”（洪翰周，〈智水拈筆〉）他認為元祐時期，性格豪放諧謔的東坡與拘于古禮的程頤時常在朝廷上意見相左，由此釀成了洛蜀黨爭，而東坡“才勝德薄”之謂不能免。洪翰周認為當時某些攻擊蘇軾的言論，實出於洛黨人之口，因而不可盡信，這種觀點是較為客觀的。

蘇東坡對高麗的偏見和政治上反高麗的傾向，也成為影響朝鮮時代文人蘇東坡觀的形成的因素。北宋士人的高麗觀分為親高麗觀、反高麗觀、中立立場三種觀點。反高麗觀以蘇東坡為代表。<sup>8)</sup>蘇東坡的高麗觀在當時高麗、北宋、遼三角關係的情況下，從偏狹和主觀的角度出發，刻意排斥高麗，對麗宋的外交造成了頗深的影響。<sup>9)</sup>

蘇東坡的高麗觀形成的兩個核心問題是“館待費用，弊害甚重”和“麗遼之間，陰相計構”，甚至蘇東坡反對高麗購買《冊府元龜》、歷代史、太學敕式等書籍。這

8) 申采湜，〈蘇軾的高麗觀〉，中國學報，第27輯，1987。

9) 陳飛龍，〈蘇軾高麗觀之探討〉，國立政治大學學報，第64期，1992，參照。

是對國際情勢的誤判和狹隘的忠君愛民思想的表現。但當蘇東坡聽到朝廷準備指派他出使高麗時，曾以“人生一段美事”表露了他的感情，展示出他對高麗看法的另外一面。<sup>10)</sup>對於他這樣的高麗觀，柳種睦解釋為：“蘇東坡作為北宋的愛國知識分子，為消解因自國軍事弱勢而產生的對外劣等感，因而越發產生了對本國文化的優越感”。<sup>11)</sup>

丁若庸認為蘇軾“勿以經籍賜高麗”，是蘇東坡傲慢的華夷觀念的表現：“昔蘇軾請勿以經籍賜高麗，并禁其購求，謂夷狄讀書，長其智慮也。何其狹隘而少恩哉。雖然此論則以時得行於中國也。經籍且不欲相示，況使之學技藝諸能，以強其國哉。”（丁若庸著，《技藝論三》，《與猶堂全書》，第一集，卷11）

由于朝鮮時代的中心思想是儒學，因而蘇東坡有關佛教、道教、莊子方面的思想受到部分純儒（性理學派）的排斥。這一點也成為否定蘇東坡觀的原因之一。此不細說。

除對蘇軾持肯定和否定兩種對立的觀點外，還有一些較為折衷的觀點。如：

酒三行，正襟端坐，良久咏赤壁賦。曰，“蘇公雖不無病痛，其心之寡欲處，於‘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以下數句見之矣。又嘗謫去，載棺而行，其脫然不拘如此。”<sup>12)</sup>

李滉(1501--1570)是繼承發展朱熹學問的大儒，此文是他的門人李德弘的記錄。從中可知李滉對蘇東坡進行了比較客觀的評價。李滉在指出“蘇公雖不無病痛”的同時，通過《前赤壁賦》中的幾句和東坡被貶到海南島時“載棺而行”一事，強調“其心之寡欲處”，“其脫然不拘”。又如：

10) 柳基榮，《蘇軾對韓國古代文學的影響及其高麗觀之探討》，復旦大學中文系博士論文，1996. 11, 121-139頁, 145頁。

11) 柳種睦，《蘇軾和高麗》，中國文學，第38輯，韓國中國語文學會，2002.11, 83頁。

12) 李德弘記錄，《退溪先生言行通錄》，卷3，《增補退溪全書》四，成均館大學校大東文化研究院，1992, 59頁。

(1) 古文之學以來，天下皆曰，吾學韓文公，而吾鮮見有學之者矣。天下皆曰，吾學蘇文忠，而吾鮮見其有能善學者矣。夫二公文章之雄傑橫逸，屹立古今，孰不慕之？而其難學者如彼，則與其為韓蘇而無成，毋寧為王、曾而成，此公平日所自明其為文之旨，而余之所醒於耳，而薰於心者也。（金澤榮，〈明美堂集序〉，〈明美堂集〉）

(2) 嘗切論之，文章者，氣之發也，氣猶水也，文猶浮物也。氣不足以御文則猶水之小者不能勝物，而至於沉膠橫決。故子瞻之詩多有粗者，而人不知其有粗者，氣盛故也。後之學子瞻者，其氣不及，故其弊大率多粗。此明未至於子瞻者，宜精而不宜粗也。（金澤榮，〈申紫霞詩集序〉，〈申紫霞詩集〉，3頁。）

金澤榮（1850-1927）在（1）文中，認為韓愈、蘇軾的文章雖有“雄傑橫逸，屹立古今”的長處，也指出韓蘇文章竝為難解。他認為“與其為韓蘇而無成，毋寧為王曾而成”。在（2）文中，金澤榮認為東坡詩之所以難學，在於東坡詩“氣盛”，學之者“氣不及，故其弊大率多粗”。可見學習東坡詩的人應棄“粗”學“精”。

#### 四、朝鮮時代文人接受蘇東坡的表現及其原因

朝鮮後期詩壇的核心人物申緯（1767-1845）、姜瑋（1820-1884）、李建昌（1852-1898）、金澤榮（1850-1927）對蘇東坡、黃庭堅都極為推崇。以姜瑋為首發起了紀念蘇東坡生日的詩會“拜坡會”。每逢陰歷十二月十九（即蘇東坡的生日），一群詩人聚會，飲酒作詩。這一儀式一直持續到1945年。在“小論”黨的領袖鄭丙朝家每年到了東坡生日，20多個詩人聚會舉行生日會，而“老論”黨對此頗有微詞。1945年，83歲的徐燕園舉行了一次拜坡會，此後沒再舉行。<sup>13)</sup>

為什麼朝鮮時代文人這樣喜歡蘇東坡呢？可以概括如下：

首先是蘇軾的人品、文品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他們欽慕蘇東坡的人品，他那直

13) 据洪贊裕先生的證言，1993. 5。

言不諱而從不趨炎附勢的性格，愛國愛民的志向，豁達的人生觀，處境艱難而能化悲爲樂的超然心態，都令朝鮮時代的文人感動。東坡文學本身的卓越的藝術性，尤其是前後《赤壁賦》等名作所具有文學魅力，均使朝鮮時代的文人高度認同。如徐居正對蘇軾的氣節、文章就十分推崇，尤其追慕蘇軾的赤壁之游：“先生氣節凌宇宙，先生文章煥星斗。追憶先生四百年，赤壁風月還依然。我今爲賦赤壁詩，欲喚先生酌一卮。”（《蘇仙赤壁圖》，《四佳集》卷51）

李睟光云：

李容齋、鄭湖陰詩，大抵學蘇黃也。湖陰問曰：“人皆謂余學蘇黃，而不謂公學蘇黃，何也？”容齋答曰：“君用其文字，故人見而易知；我取其意格，故人不知之。”湖陰伏其言。（《芝峰類說》，卷9，文章部2，詩）

這段敘述揭示了對蘇東坡詩的兩種接受方法，一個是取其意思和格調，另一個是用其文字。前者接受蘇東坡詩的理想，帶有創作性，而後者則是初步模仿的接受方法。而無論哪種接受方法，都說明朝鮮時代文人把蘇東坡作爲一個典型的文化模型。蘇東坡是他們的人生以及文學的模型。從他天才的作品中找到了自己的快樂。

其次是朝鮮時代重文，朝鮮以宋爲立國的模型，文學上也重視唐宋八大家文。通過蘇東坡文學，朝鮮知識分子能獲得文學滋養，可以提高自己作漢詩、漢文的熟練程度。朝鮮時代的文人具備基本的文化素養，能讀寫漢詩文，這一點爲接受蘇東坡奠定了基礎。朝鮮和明、清使節的往來，使得雙方的交流頻繁。中國版的蘇東坡詩文集傳入朝鮮較多，這成爲蘇東坡文學流行的基礎條件。在朝鮮，蘇東坡詩文集和選集的刊行使朝鮮時代的文人較爲容易地閱讀。有關蘇東坡的詩話在朝鮮也很流行，並成爲評論蘇東坡的標準。由于韓中交往密切，南宋特別是清代的蘇東坡熱，都對韓國文壇有影響。高麗時代的蘇東坡熱在某種程度上也影響了朝鮮時代的文人。

三是朝鮮時代的知識分子經歷了與蘇軾相似的文禍、黨爭和戰爭，其處境與蘇

東坡極爲相似，因而他們能產生共鳴，從而把蘇東坡視爲理想的模型。蘇東坡屢經浮沉的處境在朝鮮時代文人中引起共鳴，他的仕隱觀給朝鮮時代文人以深刻的啓示。蘇軾作品爲知識分子擺脫精神苦悶找到了新途徑，給懷才不遇的文人以共鳴。如申欽（1566-1628）《示翊聖翊亮》（《象村集》，卷6）詩云：

吾衰似老坡，晚途坐迢遠。  
浮沉文字間，坡與吾同然。  
淪落何足嘆，此樂足窮年。

申欽晚年罹難，他將自己的浮沉人生融入詩文之中，并不因淪落而嘆息，反而以之爲樂。這都與東坡頗類似。朝鮮時代的國家中心理念是儒學，其思想制約比較強烈。不少知識分子，希望擺脫制約，渴求自由廣闊的思想。蘇東坡文學裏有諸如佛教、老莊思想，正可使朝鮮知識分子借以消解現實中的精神苦悶，使內心世界更加開闊。

## 五、結論

蘇東坡作爲朝鮮時代文人的人生與文學的模範，給他們提供了文學的靈感、創作技巧、藝術成果和經驗。他們欽慕蘇東坡而接受他的詩文，因個性與環境的差距，文學上的結果出現了個性的面貌，他們通過東坡的人生及文學接受，熟練漢詩，擴大內心世界，獲得了人生和文學的滋養，在此也投影了韓國式的情感，他們認爲學習蘇東坡的詩文時，詩句和語言的模擬固然重要，接受其精神或格調的陶冶是更理想的方法，他們接受蘇東坡文學，并以發展自己和本國文化爲目標，不是局限于模仿學習而是要升華到文化、文學精神的接受。

朝鮮時代蘇東坡熱潮的轉變與以南宋前期、清代、當代爲頂點的中國蘇東坡熱



潮有某種時差，出現了類似的波濤起伏，但就其時間和程度而言，略有差異。這是因為中國的文學思潮對朝鮮的影響以及朝鮮時代本身的儒學（性理學）的轉變都需要一個過程。當然，朝鮮本身詩文思潮的轉變也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因素。韓國的蘇東坡熱在高麗中期達到頂峰，并持續到朝鮮前期。朝鮮中期唐詩漸漸流行，對蘇東坡的學習有所減弱。到了後期，由于對儒學（性理學）本身的反省，加之清代文學思潮的影響，蘇東坡熱再次湧起。

朝鮮時代文人的對蘇東坡及其詩文的觀點分爲肯定的、否定的、折衷的觀點。肯定觀點的勢例，把蘇東坡評爲“豪傑之士”，“和而不同”的人物，把其詩文高度地評爲“豪氣”，“逸韻凌青霞”，“仙境”，“百態橫生不可窮”，“足驗治世氣象”，并且對不念東坡詩的文人說：“非卑也，不解也”。否定觀點的實例，東坡禁止高麗人買書，評爲“狹隘而少恩”。因作品多用典故而難解。有純儒的觀點，把蘇東坡評爲“吾道之蠹賊”。折衷觀點的實例，如“文章之雄傑橫逸，屹立古今，……難學”，“子瞻之詩，多有粗者，而人不知其有粗者，氣盛故也”。尤其是否定觀點與北宋洛蜀黨爭，蘇東坡愛好佛教、道教、莊子及蘇東坡狹隘的高麗觀有內在關聯。由于朝鮮時代儒學主要繼承中國的程朱學派，與蘇東坡在學派上、學問上有對立關係，所以朝鮮時代儒學主要繼承中國的程朱學派，特別是朱熹論評的影響，不可忽視的是，蘇東坡對高麗的偏見，在政治行迹上反高麗的傾向。但是大體說來，朝鮮時代對蘇東坡的評價相當高。

朝鮮時代的不少文人在各地通過“赤壁船游”，再現了赤壁游覽的風氣，還有朝鮮後期一些詩人成立了“拜坡會”，以紀念蘇東坡生日。這些記錄都證實了當時的文人對蘇東坡的喜愛。

朝鮮時代文人接受蘇東坡的原因可以概括如下。第一，是蘇東坡的人品、文品對於朝鮮時代文人具有很大的吸引力。第二，是朝鮮時代崇尚文藝，朝鮮以宋爲立國的模型以及文學上也對唐宋八大家的重視，爲朝鮮時代的“蘇東坡熱”提供了適宜的土壤。第三，朝鮮時代的知識分子經歷了蘇軾相似的文禍、黨爭和戰爭，其處境與

蘇東坡極爲相似，因而他們能產生共鳴。

總之，朝鮮時代文人把蘇東坡當作人生和文學的典型、理想的模型。蘇東坡屢經沉浮的處境在朝鮮時代文人中引起共鳴，他的仕隱觀給朝鮮時代文人以深刻的啓示。通過其文學接受，他們自己的文學水平也提高了，更進一步表現了獨自的精神世界。

## 【참고문헌】

### 一. 單行本

#### 1. 蘇東坡關係書目

- . (清)王文誥 輯注, 孔凡禮 點校, 《蘇軾詩集》(全8冊), 中華書局, 北京, 1987.
  - . 孔凡禮 點校, 《蘇軾文集》(全6冊), 中華書局, 北京, 1990.
  - . 謝桃坊, 《蘇軾詩研究》, 巴蜀書社, 成都, 1987.
  - . 王水照 選注, 《蘇軾選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 1984.
  - . 王水照 著, 曹圭百 譯, 《中國의 文豪 蘇東坡》, 月印, 2001. 6.
  - . 王水照, 《蘇軾》, 萬卷樓圖書, 臺北, 1993.
  - . 曾棗莊 等著, 《蘇軾研究史》, 江蘇教育出版社, 南京, 2001. 3.
  - . 洪瑀欽, 《蘇東坡 文學의 背景》, 嶺南大出版部, 慶山, 1983.
- 1990.

#### 2. 原典資料書目

- . 《朝鮮王朝實錄》
- . 《破閑集, 補閑集》(合本), 亞細亞文化社, 1982.
- . 《後漢書》
- . 金萬重, 《西浦漫筆》, 景仁文化社影印本.
- . 金宗直, 《青丘風雅》, 아세아문화사, 1980.
- . 徐居正 撰, 《東文選》, 民族文化推進黨, 1977.
- . 徐居正, 《東人詩話》, 朝鮮古書刊行會, 1991.
- . 徐居正, 《四佳集》, 影印標點 韓國文集叢刊, 第10-11冊, 민족문화추진회.
- . 徐居正, 《국역 東文選》, 민족문화추진회, 1983.
- . 釋 惠洪, 《冷齋夜話》
- . 申緯, 《申緯全集》, (原名: 敬修堂藁), 太學社, 1983.
- . 申緯, 《申紫霞詩集》, 金滄江重編本.

- . 申欽, 《국역 象村集》, 민족문화추진회, 1994. 9.
- . 李建昌, 《明美堂集》, 保景文化社, 1997.
- . 李奎報, 《東國李相國集》, 影印標點 韓國文集叢刊, 第1-2冊, 民族文化推進黨, 1990.
- . 李晬光 《芝峰類說》, 景仁文化社, 1970.
- . 李滉, 《增補退溪全書》, 成均館大學校 大東文化研究院, 1992.
- . 丁若庸, 《輿猶堂全書》, 影印標點 韓國文集叢刊, 第281-286冊, 민족문화추진회, 2002.
- . 正祖, 《弘齋全書》, 影印標點 韓國文集叢刊, 第262-264冊, 민족문화추진회, 2001.
- . 許筠, 《국역 惺所覆瓿藁》, (주)민문고, 1989. 10. (중판).
- . 許筠, 《許筠全書》, 亞細亞文化社, 1980.
- . 洪萬宗 著, 洪贊裕 譯註, 《譯註詩話叢林》(上下), 通文館, 1993. 3.
- . 洪萬宗, 《詩話叢林》, 亞細亞文化社, 1973.
- . 洪翰周, 《智水拈筆》, 亞細亞文化社, 1984.
- . 黃玿, 《黃玿全書》, 亞細亞文化社, 1978.

### 3. 기타 單行本

- . 金台俊 著, 崔英成 譯註, 《譯註朝鮮漢文學史》, 시인사, 1997. 3.
- . 東方文學比較研究會 編, 《轉移와 受容》, 學文社, 1986. 3.
- . 閔丙秀, 《韓國漢詩史》, 太學社, 1996. 11.
- . 卞鍾鉉, 《高麗朝漢詩研究 - 唐宋詩 受容樣相과 韓國의 受容》, 太學社, 1994.
- . 徐遠和, 《洛學原流》, 齊魯書社, 1987. 9.
- . 孫八洲, 《韓中漢詩研究》, 빛남, 1986.10. 再版, (1992. 10. 初版)
- . 열상고전연구회, 《한국의 序跋》, 바른글방, 1992. 5.
- . 章旭昇 著, 李海山, 禹快濟 共譯, 《韓國文學에 끼친 中國文學의 影響》, 亞細亞文化社, 1994. 1.
- . 尹寅鉉, 《한국한시 비평론》, 아세아문화사, 2001.9.
- . 李家源, 《朝鮮文學史(上中下)》, 太學社, 1997. 7.
- . 李丙疇, 《漢文學史》, 새문사, 2003. 2.
- . 이종목, 《한국한시의 전통과 문예미》, 태학사, 2002. 1.
- . 李昌龍, 《比較文學의 理論》, 一志社, 1990. 10.
- . 李昌龍, 《韓中詩의 比較文學의 研究》, 一志社, 1984.

- . 全松烈, 《朝鮮前期詩歌史研究》, 이회문화사, 2001. 10.
- . 전형대, 정요일, 최응, 정대립, 《韓國古典詩學史》, 기린원, 1989. 7.
- . 丁奎福, 《韓國文學과 中國文學》, 국학자료원, 2001. 5.

## 二. 研究論文

### 1. 中文

- . 柳基榮, 〈蘇軾對韓國古代文學的影響及其高麗觀之研究〉, 復旦大學 中文系 博士論文, 1996. 11.
- . 曹圭百, 〈宋朝蘇東坡與李朝金史比較研究 — 以蘇東坡海南島與金史濟州島流配文學爲中心〉, 《新宋學》, 上海辭書出版社, 2001. 10.
- . 陳飛龍, 〈蘇軾高麗觀之探討〉, 國立政治大學學報, 第64期, 1992.

### 2. 국문

- . 申採湜, 〈蘇軾의 高麗觀〉, 中國學報, 第27輯, 1987.
- . 柳種陸, 〈蘇軾과 高麗〉, 中國文學, 第38輯, 한국중국어문학회, 2002. 11.
- . 尹浩鎮, 〈韓國 漢文學의 東坡受容樣相〉, 嶺南中國語文學會, 《中國語文學》, 제12집, 1986. 11.
- . 李昌龍, 〈朝鮮朝 詩話에 投影된 蘇東坡〉, 《轉移와 受容》, 東方文學比較研究會 編, 學文社, 1986.
- . 許捲洙, 〈蘇東坡詩文의 韓國的 受容〉, 嶺南中國語文學會, 《中國語文學》, 제14집, 1988. 7.

Abstract

Acceptance of Su Dongpo's Poetry and Prose by Chosun Dynasty's  
Literary Men and Their Views on Su Dongpo

Cho, Kyu-Baek

This paper traces literary men's acceptance and views of Su Dongpo's poetry and prose during Chosun Dynasty, while researching the reasons why Su Dongpo's life and literature had been a model to the literary men, made our literature rich, and had them conscious of their culture.

The changing pattern of interests on Su Dongpo shows, to some extents, the wave of ups and downs similar to the zenith of interests on him during the beginning of South Song, Qing dynasty, and Contemporary times(after 1980s). Interests on him in Korea was the highest in the middle of Korea dynasty and continued to be the same in the beginning of Chosun. But it weakened in the middle of Chosun on account of the high popularity of Tang poetry. In the end of Chosun the fever increased because of the influence of the trends of literary thoughts in Qing dynasty and the introspection on Song confucianism itself.

The literary men during Chosun analyzed his life and writings into positive, negative, and compromising viewpoints. Examples of positive views are as follows : he was a gallant and harmonious scholar, but he was uneven. And His prose was highly assessed as that of heroism, state of hermit, and proof of fantastic idea of reign. Su Dongpo was despised as a mean and ungrateful man, because the export of books to Korea dynasty was banned by him : his writings were known to be difficult owing to much use of classics : and pure confucianists spoke ill of him as the moth of confucianism. They criticized compromisingly that his writings had faults, but he had no attachment on his writings : his style was grand, but it was difficult to learn.

In particular the negative views on him were internally related to North Song's Luo Shu Party Strife, Su Dongpo's Buddhism, Taoism, disposition of Chuangtzu preference, and his narrow view of Korea dynasty. In general the assessment on Su Dongpo by literary men during Chosun appeared to be the best.

The literary men during Chosun preferred his Chibi Fu and reproduced traits of Chibi boating excursion. And a group of poets in the end of Chosun held poetry society commemorating his birthday by making Dongpo Respect Association. Those traits proved the preference trend of Su Dongpo.

The literary men accepted him for the following three reasons: firstly, his personality and level of his sentences had great attraction of absorption. Secondly literature respect trend and Song dynasty were the major model of Chosun dynasty's building itself, and TangSong Bajia prose was mattered literally. However some pure confucianists accepted them critically and selectively because of the difference of their thoughts and schools. Finally, the literary men sympathized his life and literature as they experienced similar massacre of scholar, party strife and war.

To sum up, the literary men during Chosun considered him as an ideal and typical model for their lives and literature. In addition Su Dongpo provided the intellectuals with methods of problem solution, and the poor intellectuals were moved. Furthermore the attitude for him to enter the government office and retire hinted at deep insight to the literary men. While accepting his literature, they could improve their level of literature and express their individual spiritual world.

#### Key Word

Literary Men of Chosun, Acceptance of Su Dongpo, Harmony but Disparity, Luo Shu Party Strife, Chibi Fu, Chibi boating excursion, and Su Dongpo Respect Association.